

前辈话当年

我为儿童团长的时候



我当儿童团长的时候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我当儿童团长的时候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70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R11098·47

定 价：0.36元

目 录

- (1)我当儿童团长的时候……………熊 晃
- (6)我的名字的由来……………李桂莲
- (13)红军哺育我成长……………葛明旺
- (19)找红军……………张富荣
- (25)少年看护兵……………贺新中
- (31)枪的故事……………刘 生
- (37)长征路上阶级情……………赖光勋
- (39)回忆贺老总……………熊 晃
- (44)雪山草地的日日夜夜……………苟成富
- (52)苦荞粑……………覃长生
- (57)智渡黄河……………曾纪银
- (64)奔向延安……………王文才
- (72)我的老师……………刘树和
- (79)护送朱总司令回延安……………李长林

- (85) 战火中的读书声.....高 琳
 (94) 哑巴的故事.....姜殿选
 (101) 刘霖.....刘树和
 (106) 文彬庄的诞生.....史 骥

——回忆南泥湾大生产

- (113) 毛主席视察九龙泉.....贺劲南
 (122) 难忘的学习生活.....王晋骨
 (128) 突围记.....李桂莲
 (136) 彭总的教诲.....李风友

我当儿童团长的时候

熊晃

我如今虽然已是年近古稀、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但童年时代在家乡当儿童团长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每当想起那难忘的岁月，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激情满怀。

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北盛仓乡，家中世代贫穷，没有一分田地，全家老小十口人全靠父亲做苦工养活。父亲自认命苦，实指望我能读点书，将来不再受穷，便勒紧裤带送我上学读书。然而家境困难，使我不得不几度辍学，随父亲出外谋生。有一年灾荒，地主乘机抬高谷价，家里没得铜板余米，只得靠吃野菜度日。正在危难之际，父亲幸遇一位当建筑工人的朋友，名叫朱建胜。他在浏阳县城里修建李家祠堂，便介绍我们父子俩去打短工，混碗饭吃。从这时起，朱建胜就常给我们讲财主为什么富，百姓为什么穷，

财主怎样剥削穷人的道理。我幼小的心灵中，充满对财主富豪的仇恨。

一九二六年夏，我十二岁。家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我们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父亲加入了农会，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识几个字，竟当上了儿童团委员长。浏阳城里也成立了工会和工人纠察队，为首的就是朱建胜，原来他是个共产党员。乡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减租减债，抗税抗捐，土豪劣绅有反对者，轻则戴高帽子游乡，重则开群众大会判决镇压。我带着儿童团员们操练、唱歌，开大会时给各家农友报信，游乡时用绳子牵着土豪劣绅的双手，可神气了。农会要秘密集会，我就在门外为他们站岗、放哨，农会要清算土豪劣绅的剥削账，我就给他们翻账本，找契约。我们还和农会会员涌进财主家“吃大户”，看到土豪劣绅在农会的勒令下杀猪宰鸭，吃着他们从农民手中夺去的白米饭，心里那股痛快劲真是没得话说！当时，外乡的儿童团员们都有一根童子棍，我们却没有，因为乡里的山林都是地主任萌山的。我想，农会能进地主家吃喝，我们儿童团为什么不能砍地主的树，就请我的老师给任萌山写了一封信。信上写着：“儿童团急需童子棍，贵堂山内多有

直树，希子采伐。”我把信交给任萌山，他欺我人小，气势汹汹地说：“就凭这一张纸砍我的树吗？不行！”我也怒视着他，大声说：“你敢不叫砍，我就报告农会。”这一下把他吓住了，我和小伙伴们当即砍伐了百余根笔直的树。以后，我们操练、站岗，不再是赤手空拳了。

那一年，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听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县农会委员长罗纳川等共产党人的演讲了。演讲会上，我们儿童团员总是立在人群前面，演讲人说的“总理遗嘱”、“打倒列强除军阀”、“平均地权”、“拥护北伐”，我们虽然听不大懂，但革命就是要扫除土豪劣绅、主张人人平等的道理还是明白的。潘心元还对我们儿童团讲过，有钱人穿着皮袍子，坐着大轿子，穷苦人穿着稻草鞋，抬着大财主，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穷人要过好日子，就得起来闹革命。这些话，说得我们心里象开了扇窗户，亮透了。一天，有个外乡的财主穿着缎面皮袍子，坐着轿子打我家门前过。我一见，不禁怒火中烧，急忙唤来一群儿童团员将轿子截住。那财主见是儿童团，只得乖乖下轿来。我问他：“你为么子不走路？晓不晓得，坐轿子不平等！你是把老百姓的肩膀当路踩着走。”

“我掏钱雇的轿子。”



“你的钱是哪里来的？”

“我祖上传下来的。”

“呸！”大伙一起喊道：“你的钱是剥削穷人的。”说着就要拿刀割他的皮袍子。那财主慌了，忙不迭地说：“我错了，我不晓得农会的规矩，我对不起轿伕，对不起儿童团。”这时，乡亲们都围上来，我的胆子更壮了，硬是叫他买了鞭炮，付清轿费，在炮竹声中向轿伕道了歉，作了揖。这件事一直在我们乡里传为美谈。

我当儿童团长还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蒋介石、许克祥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白色恐怖笼罩了我的家乡。我在家里呆不住了，父母便把我送进县城一家裁缝铺里当学徒。一九三〇年，彭德怀同志率领红军攻占长沙，家乡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我家也分得几亩稻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回乡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不久又参加了红军。那一年，我刚刚十六岁。

当儿童团长时火热的斗争生活虽然早已过去了，但那时强烈的革命理想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却一直激励着我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进。

（作者现是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我的名字的由来

李桂莲

我是一个已有七十岁的老人，但从小却起了个女孩子的名字，叫李——桂——莲。少年朋友，你们且莫发笑，这里有一段旧社会穷人的辛酸故事哩。

我原籍江西永新县，双亲为生活所迫，流落到安福县境。爸爸给地主扛长工，每天早出晚归，^①劳苦一天还是养不活他和妈妈两张嘴，妈妈就摆起茶水摊，赚个蝇头小利弥补生活。一九一三年我就出生在一个简陋的草屋里。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又是个男孩，按照旧习俗，这是大事，应该热热闹闹喜庆一番。可是穷苦人家哪有庆贺的条件呢！听说我出生不久，妈妈由于得不到休息和调养，又染上了伤寒，没钱治病，眼睁睁地望着我离开了人世。

家里喜事没喜，丧事又临。我这个不满月的小生

命怎么养活呢！穷人的命为什么这样苦！

我外婆闻讯，从九十多里外赶来，在乡亲的帮助下，草草安葬了妈妈，就把我抱回了家。那时正好我舅母生孩子没多久，就同时喂养两个孩子。尽管营养不足，奶水很少，但是我如同一棵顽强的竹苗，在贫瘠的土壤中奇迹般地生长着。

到了一岁多，伯伯把我接回李家。因为他只有三个女儿，把我过继给他作儿子。伯伯家同样贫寒，日子也很艰难，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

邻村有个姓史的财主，爷爷欠他的债。我快三岁的时候，财主听说李家有个男孩，便放出风来，要我去抵债。原来这史家也只有两个女孩，按旧社会的说法，没有男孩就不能传宗接代。这风声传到了我们家，急坏了我伯伯，他就和我爸爸商量，想办法一定要保住李家这根独苗。村里有个教私塾的老先生，为人正直、机智，爸爸找他讨主意。老先生问明了情况，知道我出生在外县，又在外婆家吃奶长大，来到伯伯家时间不长，财主不一定已摸清是男是女的底细。他沉思了片刻，说：“给孩子来个男扮女装怎么样？”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伯伯和爸爸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冒险同意这样办。从此给我穿上了花衣，还借来一双花鞋，一顶花帽。伯伯家的大女儿叫

李梅莲，二女儿叫李福莲，三女儿叫李文莲，按照老先生的主意把我的名字改叫李桂莲，暂时寄养到学堂，如果财主来要人，由他出面应付。我的名字就这样叫起来，一直到现在也没改。为什么呢？这中间还有个缘由。那是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途中，我给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同志当警卫员，军团党代表任弼时同志在一次闲聊中问我，怎么起了个女孩子的名字？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他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这个名字不要改，它很有纪念意义。”

史家财主果然派了两个狗腿子到我伯伯家要人。伯伯说：“家里穷得养不活，送给教书先生了。”那两个家伙又到学堂，冲着老先生问：“李家有个孩子放在你这儿吗？”老先生装聋，等问了第二遍，才不紧不慢地说：“有，有！他家穷，养不活孩子，怪可怜的，我孤独一人，收养了，积个德，还可以作个伴。”接着，他大声招呼：“桂莲，桂莲，快过来呀！”

我身着女孩子的衣服鞋帽，跑到老先生身边，他象是对我又象是对来说：“桂莲这下可好啦，到老爷家去享福！”

那两个家伙看我是个女孩，愣住了，没等老先生说完，就来了火：“怎么是个女孩？我老爷交代女孩

鑄告知若渾金

沈芳



不要，不要！”

“李家四个女孩，都是苦命人，没想到这最小的时来运转，有了福气……”老先生还在叨叨。

当时虽然气走了狗腿子，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史家见人财两空，当然不甘心，把状告到了县衙门。这下乱子可捅大了。我们家只好一不作，二不休，硬着头皮应付下去。还是老先生想了个办法，他有一远房亲戚在县保安队供职，或许能起点作用。老先生不辞辛苦，跑了一趟县城，回来嘱咐我伯伯：“上堂不要怕，衙门的县官也是糊涂虫。”

过堂的那一天，伯伯把我抱上堂，史家来了个帐房先生。县官问了一通，然后说：“人家孩子明明是女的，你不知从哪听说是男的，现在人在这里，你们要，就带走。”帐房先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我们穷人居然打赢了这场官司。大人们说，桂莲命大，造化大，该当李家不绝后。

闯过了无端的灾难，可日子还是很艰难。我到了五六岁，就给人家放牛、砍柴去了。找不到活干的时候，就在几个亲戚家走动，过着半讨饭的日子。有时遇到好机会，在河塘里捉点鱼虾、泥鳅，拿到街镇上卖掉，换一碗米饭吃，就如同过上了年。

我熬到十五六岁，开始懂得一些事情了，与同村

的几个伙伴凑到一起，常常谈起生活的出路，都想去当兵吃公粮。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这一带常有一支军队在活动。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村子的时候，乡亲们多年来饱尝了国民党、保安团的苦头，没等队伍进村，大家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村里只留下一些体弱多病的老人。等队伍开走，我们回到村里，发现这次过军队和往常大不一样，村里村外没有一点被抢劫的样子，墙上醒目地贴着一幅幅标语。听老人说，这次来的队伍说话和气，不入民宅，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他们还做宣传说，穷人组织起来力量大，打土豪，分田地，人人有饭吃。以后这支队伍来的次数多了，老百姓也不害怕他们了，年轻人还和他们有些接触。交谈中，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专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对，为穷苦老百姓办事。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呀！我和两个放牛的小伙伴商定，瞒着大人，偷偷去找红军，找条生活出路。

那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的一天，我们三个朝着武公山的方向走了两天，进了深山，黄昏时刻正巧和出山的队伍遇上了。真正找到了红军，我们反倒不敢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为首的一个红军好象看出我们的心思，打量着我们的装束，又摸了摸那一双双粗糙的手，证实是穷苦的农家子弟。接着询问了家里

的情况，为什么要当红军，打仗怕不怕？经过审查，我们被接受了，编入湘鄂赣独立一师二团六连。我从此结束了苦难的童年，开始了新生活。军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它照亮了我的前程，指引着我新的人生道路。

（作者原是自治区储备局局长）